

21世纪高等教育系列教材
(汉语言文学类)

中国现代文学史

凌宇 主编

南海出版公司

责任编辑：张 辉

装帧设计：南海高教出版中心
WWW.KFBOOK.COM

21世纪高等教育系列教材（汉语言文学类）

- | | |
|-------------------------|---------------------------|
| 《大学语文》（第二版）（李山） | 《古代汉语教程》（蒋冀骋、黎千驹） |
| 《高等语文》（上、下册）（过常宝） | 《现代汉语》（吴启主） |
| 《应用文写作》（上、下册）（杨晓菊） | 《文学概论》（赵炎秋、毛宣国） |
| 《应用写作学》（李保初、徐秋英） | 《中国古代文论》（赖力行） |
| 《常用应用写作》（李伟文） |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下卷）（过常宝、康震） |
| 《普通话训练测试教程》（郑燕萍） |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下卷）（过常宝、康震） |
| 《普通话训练教程》（曹丽芳） | 《中国现代文学史》（凌宇） |
| 《普通话训练与口才艺术》（王海天） |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凌宇） |
| 《说话艺术》（朱儒楚） | 《中国当代文学史》（田中阳、赵树勤） |
| 《教师口语》（宋瑞福） |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田中阳、赵树勤） |
| 《教师口语艺术》（王海天） | 《中国现当代文学》（刘勇） |
| 《书法教程》（朱儒楚） | 《外国文学史》（谭燧） |
| 《书法基础练习册》（硬笔、毛笔二册）（汤家梁） | 《外国文学作品选》（谭燧） |
| 《书法教程与练习》（张乃田） | 《外国文学史—欧美分册》（尹允镇） |
| 《中国古典诗词赏吟》（何祖健） | 《语言文字应用》（王阿舒） |
| 《诗文名篇双语读本》（李爱平） | 《中文学科论文写作训练》（姚承嵘） |
| 《诗词吟诵艺术》（许凤娇） | 《语言学概论》（编委会） |
| 《美育与艺术欣赏》（朱儒楚） | 《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委会） |
| 《儿童文学》（蒋风、韩进） | 《比较文学：理论与研究》（邓楠） |

ISBN 7-5442-2763-4

9 787544 227636 >



ISBN 7-5442-2763-4
定价：39.00元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主编 凌 宇

编著者(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攸欣 吴 敏 李树槐

罗成琰 周国良 凌 宇

徐 麟 谭桂林 颜 雄

南海出版公司

2005·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凌宇主编.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2006. 1

ISBN 7-5442-2763-4

I. 中... II. 凌... III. 现代文学—文学史—中国 IV. 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75882 号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主 编 凌 宇

责任编辑 张 辉

特约编辑 聂 敏

装帧设计 水木时代(北京)图书中心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城大厦五层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安徽省蚌埠市广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517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763-4

定 价 39.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绪 论.....	(1)
上 编	
1917~1927 年的文学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7)
第一节 历史渊源与外来影响.....	(7)
第二节 改良八事与革命三义	(11)
第三节 观念更新与话语转型	(15)
第四节 社团流派与文学期刊	(18)
第五节 思想论争与文学批评	(22)
第二章 诗体的解放与探索	(27)
第一节 概 述	(27)
第二节 初期白话诗	(31)
第三节 郭沫若	(35)
第四节 湖畔诗人和小诗运动	(41)
第五节 闻一多	(45)
第六节 徐志摩	(48)
第七节 李金发	(52)
第三章 鲁迅——现代小说的奠基者	(56)
第一节 生平与创作道路	(56)
第二节 《呐喊》与《彷徨》	(60)
第三节 《阿 Q 正传》	(75)
第四节 《故事新编》	(80)
第四章 “问题小说”与“乡土小说”	(85)
第一节 概 述	(85)
第二节 冰心 庐隐	(90)
第三节 王统照 许地山	(94)
第四节 叶圣陶	(96)
第五节 王鲁彦 彭家煌，废名.....	(100)

第五章 自我抒情小说	(104)
第一节 概 述	(104)
第二节 郁达夫	(106)
第三节 创造社其他作家	(109)
第四节 浅草社作家	(112)
第六章 个性独异的散文	(114)
第一节 概 述	(114)
第二节 鲁迅散文(上)	(117)
第三节 周作人	(128)
第四节 冰心 朱自清	(131)
第五节 梁遇春 许地山	(138)
第七章 现代戏剧的兴起	(143)
第一节 概 述	(143)
第二节 话剧体式的诸种尝试	(146)

中 编**1927~1937 年的文学**

第八章 新文学运动的政治分化与多元互补	(157)
第一节 普罗文学运动与左翼作家联盟	(157)
第二节 新月社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	(161)
第三节 “自由人”与“第三种人”的文艺思想	(165)
第四节 文艺思想上的其他论争	(168)
第五节 发展中的文学批评	(173)
第九章 左翼小说	(177)
第一节 概 述	(177)
第二节 蒋光慈 柔石	(187)
第三节 茅 盾	(192)
第四节 丁玲 张天翼 艾芜	(200)
第五节 叶紫 吴组缃	(209)
第六节 东北作家群	(214)
第十章 “京派”与“海派”小说	(220)
第一节 概 述	(220)
第二节 老 舍	(224)
第三节 沈从文	(230)
第四节 萧乾 芦焚	(237)

第五节 穆时英 施蛰存.....	(241)
第十一章 其他作家的小说.....	(246)
第一节 巴 金.....	(246)
第二节 李劫人.....	(255)
第十二章 体裁多样的散文.....	(259)
第一节 概 述.....	(259)
第二节 鲁迅散文(下).....	(263)
第三节 何其芳 丽尼 李广田 陆蠡	(282)
第四节 林语堂 丰子恺.....	(288)
第五节 报告文学.....	(292)
第十三章 现代戏剧的丰收.....	(295)
第一节 概 述.....	(295)
第二节 曹 禹.....	(298)
第三节 田汉 洪深 夏衍 李健吾.....	(310)
第十四章 新诗的分流与多元格局.....	(319)
第一节 概 述.....	(319)
第二节 臧克家.....	(323)
第三节 戴望舒.....	(326)
第四节 汉园诗人.....	(329)

下 编

1937~1949 年的文学

第十五章 新文学运动的区域分流与历史选择.....	(339)
第一节 抗战初期的文学运动.....	(339)
第二节 国统区的文学运动.....	(342)
第三节 上海孤岛与沦陷区的文学活动.....	(345)
第四节 解放区的文学运动.....	(348)
第五节 时代激流中的文学批评.....	(351)
第十六章 新诗的嬗变与整合.....	(355)
第一节 概 述.....	(355)
第二节 艾 青.....	(359)
第三节 田间与“七月”诗人.....	(366)
第四节 穆旦和《中国新诗》诗人群.....	(372)
第五节 民歌体诗.....	(378)

第十七章 国统区小说	(383)
第一节 概 述	(383)
第二节 沙 汀 钱 钟 书	(390)
第三节 路 翦	(396)
第四节 张 爱 玲 徐 汗 无 名 氏	(401)
第十八章 解放区小说	(409)
第一节 概 述	(409)
第二节 赵 树 理	(416)
第三节 孙 犁	(423)
第四节 “土改”小说	(426)
第十九章 现代戏剧的多元竞妍	(434)
第一节 概 述	(434)
第二节 历 史 剧	(437)
第三节 讽 刺 喜 剧	(441)
第四节 新 歌 剧	(443)
第二十章 渐次衰歇的散文	(448)
第一节 概 述	(448)
第二节 梁 实 秋 与 沈 从 文 的 散 文	(452)
第三节 报 告 文 学	(456)
后 记	(461)

绪 论

半个世纪以来，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有史以来四种性质互异的形态概念，已被普遍接受并广泛使用。中国现代文学也因此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这一地位，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一方面，是近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越界”现象，暴露出原有疆域分割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脆弱性；另一方面，一些新的文学史观念的出现，例如“20世纪中国文学史”^①，便是其中已经产生广泛影响的一种——更是从根本上动摇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科独立性。

原有的划分及对这种划分的质疑与挑战，自然源于不同的史学标准。古、近、现、当的划分法，基于对各自赖以产生的中国社会及其主要阶级矛盾性质的认定——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阶级矛盾的性质决定着文学的性质。由此而来的对中国现代文学性质的界定——“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②，既区别于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古代文学，又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近代文学，其独立的品格便被突显出来了。然而，如此一来，文学史完全成为政治史、革命史的附庸，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与内在的规律性被消解，而由此进入文学史叙述的操作过程，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评价取舍，就难免以偏概全、轻重失衡、贬抑失当。

如果从文学的价值形态与艺术形态着眼，中国现代文学与20世纪其他时期的文学明显的保有内在的质的同一性。因此，“20世纪文学史”这一概念，也许更具有作为一门学科所需要的独立品格。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现代文学既非具有独立的价值形态的文学史概念，也不是一种具有严格的独立意义的艺术形态概念，它只是一个有关文学的时间概念或文学发展的阶段概念，即所谓中国现代文学，是发端于1917年《新青年》杂志倡导文学革命，迄于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召开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

认定中国现代文学只是一个阶段的文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主性固然被消解；但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却在更广阔的文学

① 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二十世纪文学三人谈·缘起》，《读书》1985年第10期。

② 唐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版，第8页。

界域内，获得了更为丰富的价值内涵和文学意义。从 20 世纪初叶到《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前这一时期的文学，只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这部戏剧的序幕，而中国现代文学则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上卷，是它的奠基期。从文学的价值形态到话语形态，完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根本性的转变，而由此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主题取向及基本的主题群落，则决定着 20 世纪文学的总体走向。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历程，是从 20 世纪初叶开启的。而真正完成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的历史转变——从话语模式到价值观念的全面转型，则是中国现代文学。

首先，其表现为文学总体价值取向的嬗变。这一嬗变，肇始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对民族生存危机的反思。而这一反思，又经历了从物质文化层面，到政治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的艰难探索过程。正如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所说，由最初“器物上感觉不足”到“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正是这种“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最终导致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性的批判。在否定性层面上，它是对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全面解构，而在肯定性层面上，则是对民族文化品格重构的呼唤。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同时发生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感应着民族文化变革的这一历史要求，中国现代文学从其发生伊始，其总体的价值取向就集中重建怎样的民族文化品格与如何重构上，这不仅表现为一种理论倡导，而且体现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从鲁迅早期关于“立人”的思想，到五四时期李大钊之再造“青春之我”，胡适对“新人格”的诉求，周作人的人道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立人主张，到 40 年代初沈从文“经典的重造”，直至延安时期提出的塑造“无产阶级新人”的创作主张，对新的民族文化品格的呼唤，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并一直延伸到当代。

然而，上述种种有关民族文化品格的诉求，从其预设赖以成立的文化资源上看，由于西方人本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三种主要文化形态的参与，却呈现出复杂的多元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 20 世纪中国民族文化重构史，就是这三种主要文化形态争夺重构主导权的历史。它们彼此间的联盟与对立，演绎出一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三国演义”。而由此衍生的文学创作的基本主题群落——父子冲突、灵肉冲突、国民劣根性批判、传统美德的发掘、传统美德与因袭重负的两难选择、个性主义与集体主义冲突、家国冲突、宗教人伦与世俗人伦的冲突、阶级性与人性的冲突、原始生命力的张扬等等，其内涵的不同文化冲突所构成的叙述张力、由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和

探索精神体现出来的文化焦虑及隐伏于作品背后的作家心路历程,铸就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富魅力和真正的价值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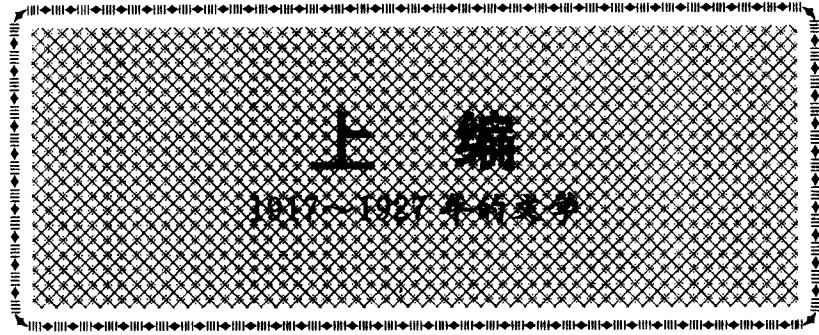
重构民族文化品格的总体指向,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两个鲜明特征:其一,对普通人的平凡人生的强烈关怀。对民族文化品格重构的思考,始终侧重于国民灵魂的改造上。对知识分子和城乡劳动群众的人生命运的抒写,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题材领域。中国现代文学的这种平民精神,开创了20世纪中国最宝贵的文学传统。其二,现实主义精神烛照下的创作方法的多样性。在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本无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之分。这种民族文学的集体无意识,也阻碍着中国现代作家信奉某种单一的创作方法。虽然,在20年代,有过李金发的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移植,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也分别倡导过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30年代,新感觉派也曾风光一时,但无论就文学的整体形态,还是就每位作家的创作形态而言,却呈现出一种“杂糅”——创作方法的多样性特征。然而,无论是以某种创作方法为主也罢,还是“杂糅”诸种创作方法于一体也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却一律表现出对现实人生、对20世纪中国问题的强烈关注。现实主义精神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对古代文学的转型,同时表现为话语模式的嬗变。“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以新道德代替旧道德”被视为新文学运动的两面旗帜。它分别从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简明地描述了中国文学这一历史嬗变。可是在这里,文言——白话之变,仅仅被看做是语言形式之变。然而,从深处看,发生在五四时期的文言——白话之变,绝不仅仅是语言形式之变,而是一种话语模式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从胡适倡导白话文,到白话文获得正宗地位这一转变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作为一种话语模式,决定着文学的基本叙述形态,关涉到谁说、对谁说、说什么诸层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型,开启了中国文学从个人话语(说自己想说的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言说主体与言说对象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到启蒙话语(启蒙者的言说,启蒙者的角色认定决定了言者与受者的启蒙——被启蒙的关系),再到大众话语(言说者成为大众的“代言人”,原先在启蒙话语中的启蒙者变成受教育者,被启蒙者成为教育者)的历史行程。于是,原先似乎游离于具体的文学创作形态的有关白话——文言之争、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等文学现象,其内涵的深刻意义便浮现出来了——贯穿于现代文学话语模式演变背后的思想文化冲突,与民族文化品格重构这一现代文学价值层面的诉求谐振。而且,文学话语模式的演变并不到现代为止。在当代,文学话语模式似乎又呈现出从大众话语到启蒙话语,再到个人话语的回流趋势。从20世纪初到90

年代,文学话语模式演变过程所呈现的这种回环形态或螺旋式形态,是 20 世纪中国耐人寻味的文学语言现象。

诚然,作为文学的话语模式,除了谁说、对谁说、说什么之外,还有一个如何说的问题。正是在这一点上,见出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性的成就与缺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即使仅仅在如何说的层面上,也诞生了一批杰出的优秀作家,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其中,有些还堪称白话文学的写作典范。这些作家与作品,不仅在当时产生过极大影响,而且极大地影响着当代文学的面貌。然而,在整体的艺术成就上,中国现代文学还难以同世界文学比肩,同中国古代文学的成熟相比,也还显得幼稚。就诗歌而言,从初期的白话诗到 40 年代的“九叶诗派”,其体式虽迭经变迁,却始终没有脱出尝试期;在小说方面,叙述模式尚嫌简陋,长篇创作尤显薄弱,没有诞生出史诗式的经典之作;话剧创作又带有过重的模仿、移植痕迹,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话剧精品尚不多见;散文虽然在五四时期便呈现早熟迹象,却是更多地得益于中国古代散文的遗传。而到三四十年代,报告文学、杂文的兴盛几乎淹没了抒情散文的进一步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毕竟只是白话文创作的初始阶段。相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白话文表现为语言形式的一种突变。而短短的 30 年,既不能与拥有数千年写作历史的古代文学同日而语,也无法同语言形式的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的西方现代文学相比。另一方面,又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情况相关。在近、现代,中华民族面临的内忧外患的历史处境,以及由此孕育的民族忧患意识与作家们意识到的历史使命感,使得在文学观念方面,过多地强调了文学的启蒙、教育功能,而容许与默认了重思想、轻技巧,将文学创作等同于一般宣传品倾向的抬头,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叙述方法上取得更大的进展。

然而,无论如何,中国现代文学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工程奠定了基础。它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它所留下的成就与问题,都将对中国文学的现实与未来产生深刻影响。深入地研究、总结中国现代文学 30 年的经验与教训,以铸造中国文学的新的辉煌,则是文学后来者的历史使命。





第一章 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与发展

第一节 历史渊源与外来影响

1917年1月,由北京大学文科教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发表了留美学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文章针对中国旧文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改良文学的八项主张,表达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要求改良文学以使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共同愿望。次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一文予以呼应,首先“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胡适、陈独秀之后,又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相继撰文参与“文学革命”的讨论。1917年底,应陈独秀之邀,胡适提前回国并到北京大学任教。1918年春,《新青年》编辑部扩大,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胡适等人先后参加了编辑工作。于是,一场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以《新青年》杂志为主要阵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至此,中国文学的演变与发展也以此为标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这次文学革命的进行并不是孤立的,它的兴起与发展同20世纪初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自从鸦片战争打碎了清王朝老大帝国的沉沉昏梦之后,软弱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情势使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苦苦寻索富国强民的道路。首先有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继之有戊戌变法,效法西方搞君主立宪;然后有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但是,这些努力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共和实际上成了一块空头招牌。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清醒地意识到,封建君主专制赖以长存的精神文化基础远未被革命铲除,广大国民尚处于愚昧麻木之中,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十分淡漠。“吾国年来政象唯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①于是,继科技引进、体制革命之后,思想启蒙被寻找救国道路的知识分子们推向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最前沿。他们认为,思想

^①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1916年1月《新青年》第1卷第5号。

启蒙可以同时解决辛亥革命暴露出来的两大问题，既能够通过对儒家文化传统的批判铲除封建君主政体的精神基础，又能够通过引进西方文化中的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等观念唤醒国民，启发国民，促进国民意识的现代化，进而实现国民人格的改造与重铸。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创刊，标志着20世纪初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该刊一开始就把思想革命为己任：一方面集中而猛烈地攻击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精神支柱孔孟儒家学说；另一方面大力介绍西方自由民主学说与科学进化思想。由于思想革命的主要目的是把国民从封建伦理道德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因而作为封建伦理道德最有效也最常用的载体，中国封建时代的旧文学就不得不在新文化运动的反对之列；同时，由于思想启蒙的主要对象是处于蒙昧状态的下层民众，为了让新的思想观念能以最通俗的形式为缺少教育的下层民众所接受，与日常口语严重脱离的文言文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对象。正是在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这一中心任务方面，1917年开始的这场文学革命既是对20世纪初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必然要求的顺应，也是这场新文化运动曾经最早取得的成就的一个组成部分。

恩格斯曾经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这场文学革命运动也是这样，它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由维新派人士发起的文学改良运动。19世纪末维新派领袖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是集学术文章于一身的政治家，他们在从事政体革命的同时，也敏锐地感觉到了文学作为思想的重要载体，对于传播自己的改良主张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在戊戌变法前后几年里，曾经提出过许多文学改良的主张，其中包括“新文体”、“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及“白话文运动”等。

“新文体”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是梁启超，他在戊戌变法后流亡海外，先后在香港等地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他自己也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在政治思想上宣扬君主立宪主张，在文体形式上则有意识地进行改良实验，目的在于把文章从八股文、桐城古文和骈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创立一种新文体。梁启超后来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新文体”作过如下自述：“启超夙不喜桐城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5页。

对于读者颇有一种魔力焉。”由此可见梁启超“新文体”在当时的影响程度。这种“新文体”其实是一种改革了的文言文，虽然尚未脱尽文言的窠臼，但它显然为中国文学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型起到了桥梁的过渡作用。“小说界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也是梁启超，他在1902年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面猛烈攻击旧小说“诲淫诲盗”，一面大声疾呼把小说与社会改良结合起来，他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格，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梁启超把小说推崇为“文学之最上乘”并极其重视小说的宣传启蒙作用，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无疑是开风气之先而又惊世骇俗的。它以疾风迅雷之势，打破了歧视小说的封建文学观念，开创了一个欲藉小说以改良社会、开通民智的文学时代，对中国新文学的产生有着直接的影响。

“诗界革命”的主张首先是由黄遵宪提出来的，黄遵宪是清末大臣，曾出使东洋，对西方文明有直接的了解，他曾支持政治维新运动，在文学方面也力主变革。在《人境庐诗草》中，他抨击了封建文人尊古贱今的谬误观念，挖苦了旧文学中沾习剽窃的不良风气，更可贵的是他提出了“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创作主张，在当时确实是一种进步的见解，不失为中国现代文学白话新诗建设的理论先导。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口号，主张诗歌要有新意境、新语句，这种新意境、新语句虽然只是发挥维新派之所长，在诗歌中杂以许多新兴名词，如谭嗣同“纲常惨以喀私德，法令盛于巴力门”之句（《听金陵说法》），但在近代诗歌崇尚唐宋的复古风气中，能够“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这在以诗歌为文学之正宗形式的文化传统氛围中，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白话文”的提倡也是晚清维新派的一大贡献，黄遵宪根据自己对西方文明进步的考察，在《日本国志》一著中要求应使“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并且提出三点重要意见：一是中国文字之所以难学，是因为语言和文字不相合的缘故；二是文字和文体的日趋简易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自然规律；三是小说家为了更好地发挥文学的用途，将来只有在文字上更趋简易一途。当时极力主张采用白话文的还有裘廷梁，他自己编辑了一套《白话丛书》，在序言中，他用“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这样沉痛有力的分析把文字和语言分离的坏处说得十分具体与彻底。他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正式揭开了20世纪文言与白话之争的序幕。维新派们不仅在理论上倡导，而且组织白话学会，创办白话报刊。戊戌变法前后出版的白话报纸计有《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京话报》等十余种。这些先驱者的主张与实践对五四新文学革命以白话代替文言之主张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与直接的。